

DOI: 10.19327/j.cnki.zuaxb.1009-1750.2016.1106

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中国道路

杭 聪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006)

摘 要: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出发,探讨中国道路在世界工业化和全球化进程中的地位,认为中国为东方社会发展工业化、参与全球化摸索出一条独特路径。中国道路的发展方向由基本国情所决定,即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强政府传统和广泛共识。除批驳一些错误看法外,文章还阐述了中国道路的适用性及意义。

关键词:世界历史理论;中国道路;工业化;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750(2016)06-0006-05

一、世界历史中的比较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论述了人类历史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如何交融,认为纵向历史受横向历史的影响并决定着后者。他的论述包含两部分:一是西欧如何进入的资本主义社会,二是东方社会如何经由资本主义殖民扩张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甚至跨越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谈道: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创造出全球性的市场经济,它的扩张无视意识形态、宗教和道德等文化的差异,因而也就打破一切政治壁垒,仅剩的壁垒也无非为保护民族兴办大工业,从而消灭各民族的特殊性,产生革命性的无产阶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大工业同资本主义的发展联系在一起。马克思晚年认识到大工业生产和资本主义的可分离性,故而提出“卡夫丁”峡谷的论断。由此,大工业发展所依托的社会环境分为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而两者又统一于市场经济之中。

16世纪以来世界历史主要表现为两个进程:一是工业化,二是全球化。工业化进程体现出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全球化进程显示着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前者决定着后者,并受后者的影响。从当前回望过去,两个进程都受到资本主义的扭曲。资本主义工业化激化出全球性的阶级矛盾,为自己准备了掘墓人;资本主义全球化激化出全球性的民族

矛盾,表现为反对殖民主义和不公正秩序的运动。两种矛盾呈一体主次之分,激化俄国、中国等先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从而让世界历史的发展出现多样性。

从人类具体实践来看,工业革命带来过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经济,计划经济也不等于社会主义经济,两种经济都是对工业经济不同历史条件的适应方式。计划经济主要针对供给严重不足的情况,市场经济主要针对需求严重不足的情况。前一点从苏联模式建立的历史过程可以得到证明,后一点从历次经济危机得到证明。前一种情况属于特殊状态,符合饱经战火的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境况,后一种情况属于人类社会经济较为普遍的状态。苏联因为未能适应自身环境的变化,未能最终跨越卡夫丁峡谷;中国不断深化市场经济改革,不仅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而且能够不断向前迈进。

中国的这种跨越昭示出东方社会的历史如何纵向发展,自然这种发展是在资本主义使人类横向联系空前发展,世界历史空前统一的条件之下。

在马克思看来,英国代表的资本主义在印度代表的非西方社会发挥“双重使命”,即破坏旧有道路,建设类似欧洲的新道路。这股外来力量所起作用的大小,要看印度人民掌握先进生产力的程度。换句话说,看印度人民是否能够走出自己的道路。他还描绘了东西方融合发展的国际秩序,这种国际

收稿日期:2016-09-2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战后英国英属撒哈拉以南非洲政策研究”(15CSS02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杭 聪,男,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非洲史、英帝国史。

秩序处于一切最先进民族的共同监管之下,即民主化的治理方能免除人类发展道路的苦楚。

就英国代表的西欧资本主义殖民强国的扩张行为而言,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建立在非西方原有发展道路毁灭的欧洲移民殖民型,旧有的历史断绝如美洲的印第安人和印加人、大洋洲的毛利人等,以及非洲某些族群的遭遇。欧洲移民以复制母国的发展道路为目标,成为“帝国”治理模式下的模范地区。另一类是直接进行殖民统治的地区如印度,由于殖民者片面发展最有利可图的部门,殖民地独立后成为跛脚巨人。还有一类是间接进行殖民统治的地区如中国、日本,他们能够先后走出自己的道路。由此看来,外来因素的强度要适当,并非经受殖民统治越深的地区发展道路便越好。关键在于,各地有无力量走出适合当地情况的发展道路。

如此来讲,“帝国”或称为单一普遍性的历史道路并非当下急迫性的选项,各条道路自我发展,在民主的基础上建设国际秩序,是当前世界历史阶段性要旨。中国道路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获得世界历史意义。

深一层来看,中国的工业化模式同全球化背景息息相关。中国曾被马克思认作东方社会的典型之一,受建立现代大工业所需要的市场、资本、劳动力、管理等条件的限制,中国不得不探索不同于西欧社会的发展方式。西欧殖民主义国家的殖民行径成为撬动中国社会变革的杠杆。受地缘政治的影响,中国广大的幅员、强韧的社会结构阻碍任何一个殖民者独自吞食,这成为理解中国参与全球化背景的前提。故而,民族矛盾成为凝聚中国人民实现工业化的意识形态力量之一,服务于工业化成为这种民族主义区别于旧有意识形态的基本标志。受这股民族主义思想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孤立的国际环境的影响,中国人不得不选择了计划经济的方式,而此一方式的持续则是由于长期战乱留下的旺盛经济需求。随着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变化,中国加大迈向市场经济和重新融入全球化的力度。这次和新中国成立之前不同,市场化和全球化建立在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和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之上,政府能够适度保护国内大工业,国内大工业的基础也能够逐步适应全球化带来的最先进要求,所以有别于中国之前参与全球化过程中被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剥夺奴役的状态。中

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不同于东欧模式,更为平稳,取得更多经济回报,未来也不可能走向东欧模式。因为中国的社会传统同西欧社会区别过大,走东欧模式只会代价更大,效果则会更差。在这层意义上,中国的转变昭示出立足本国国情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重要性。

同世界其他大国的发展道路相较,中国道路最大特点在于自力更生式地和平参与全球化。世界历史上大国人民生活短时间内大幅改善多采用对外扩张——攫取资源的方式,古代罗马帝国如此,近代欧美大国英、法、德、俄、美亦是如此。故而有国强必霸之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潮流让这一方式不可维持,非殖民化时代贯穿20世纪后一个50年。同非殖民化并行的全球化向一种更尊重双赢规则的国际秩序转变。中国在这一股历史潮流中取得最好的成绩,同期相比甚至超过原有的欧美大国。这是中国未落入修昔底德陷阱的重要原因。而根本原因还在于有一个强政府能够捍卫自身主权,而这个政府的关注点是内向的。

如今中国政府的“一带一路”外交战略构想,其基础是合作共赢,是工业化和全球化世界历史潮流的生动体现,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实践化,是一次构建新世界历史发展图景的尝试,是已奠定一定物质基础的古老东方为构建非西方式国际社会的一次努力。马克思曾寄希望于以印度为代表的东方社会能够掌握先进生产力冲破“历史停滞”,当“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1],世界历史才能冲破“零和”游戏,迈向各民族共同进步的良性全球化,即新的世界历史纪元。在列宁帝国主义论学说的指引下,俄国率先突破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薄弱环节,以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方式争取合理的民族发展空间。在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带领下,中国人民反对任何妄图主宰全球化、扼杀世界历史发展的可能。然而,不管是“帝国主义论”“三个世界理论”,还是“一国胜利论”“世界革命论”“和平过渡论”,都未从促进人类生产力进步的高度进行全面实践。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唯有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普遍交往为前提,才能“占有”人类创造的“现有的生产力总和”,“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创造出新的世界历史。^[2]这正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价值所在。

中国的发展不能简单完全归因于全球化,发展的原因在于她重视教育的传统,由于她勤劳节俭的传统,由于她创造性地发展制造业和基础设施。简单地说,就是国家治理适应技术引领下经济的发展。历史上,英国能够引领潮流,因为她创新远洋国际贸易模式和率先建立工业社会;美国则抓住新一轮的信息革命和全球化浪潮;中国得益于建国起初30年的打基础,能够搭乘新一轮信息革命和全球化浪潮的快车。中国的劳动力教育良好、吃苦耐劳且爱储蓄,构成中国发展最大的有利条件。中国发展的未来在于她的人民懂得节制,不像欧洲片面要求高福利,然后如希腊般倒下。

二、中国道路的特征

中国实行工业化、参与全球化离不开自身基本国情:一是人口众多地域辽阔,二是强政府的传统,三是广泛共识。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长期居于世界第一的人口数量成为中国发展的首要因素。其经济发展战略便是在确保农业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制造业和基础设施以吸纳就业,并公平地利用这一渠道分享红利。在军事战略上,保持内向型关注,宁要“黄油”,强调确保核心利益前提下的“和平崛起”,保持最低限度地捍卫自身攸关利益的强制力。中国软实力增长的成就不像经济实力那么引人注目,却能动员最广泛人民参与政治、经济活动。在毛泽东时代通过政治动员的方式,在后毛泽东时代则通过经济动员的方式。在这两个时代,中国政府都尽力提供公共产品以证明自身道路的价值。

参与全球化要以强有力的民族国家为基础,中国道路离不开一个强政府。这既源于中国的政治传统,也源于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习惯上,大家认为中国代表的古代东方社会在一种大殿式的结构内,依靠家族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国家形象化为官僚体系控制着社会的方方面面,传统官僚体系的管理水平和组织能力很高。亨廷顿曾说过,传统制度越接近现代标准就越难产生现代政体。^[3]鸦片战争之后的外敌入侵打击了传统官僚体系,中国陷入散沙状态,直到共产党人立足社会动员,从底层重组社会结构,建立现代政体,中国才迈入现代化起点。在这个点上必须有强大的政府建立合法的公共秩序,因为人们可以有秩序而没有

自由,但他们不能有自由而没有秩序。必须先有权威,然后才能对它加以限制。^[3]时间迈入21世纪,全面依法治国成为习近平主席的四大治国理政方略之一,中国现代化进入冲刺阶段。中国未来的发展仍需要一个强政府,以对外捍卫主权,对内实行福利保障。

国内外对中国式强政府有误解。从历史上讲,为保持弹性,中国中央政府曾实行广泛的地方分权,州县长官拥有很大的自主权,县以下依赖地方家族统治。官僚的控制力有限,中央虽以集权向地方做合法性输出,但在实践层面经常实行“无为而治”,任地方施为。当今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学者提出源于“县域竞争”,反映出自邓小平时代以来地方政府的权威被中央政府尊重,地方政府的行为易受到来自共产党、人大和司法系统等制约。可以说,复杂的中式制约系统很难为西式头脑所理解。

中国道路的理论来源于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近60年中国经历了以计划经济为主的阶段和以市场经济为主的阶段,两个阶段的过渡很自然,两阶段本身也源于本土需要。计划经济的原因在于当时需求为主,供给稀缺;随着稀缺性转变,后30年逐步转向市场经济,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饱和,需要从供给着手,创造新的需求,市场发挥大浪淘沙的功能。中国人较快地从苏联模式中摆脱出来,以毛泽东同志《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主要标志。1982年邓小平同志明确号召: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第一个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道路(实践)、理论体系、制度三位一体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又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条大路不是‘传统的’,也不是‘外来的’,更不是‘西化的’,而是我们‘独创的’……”^[4]

这条独创大路的经济制度基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制度基础是民主集中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显著特征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格局。此一格局同自身历史传统紧密相连。在中世纪,西方社会形成土地私有制占主

体的经济格局,同中国土地国有占主体的经济格局截然不同。故而,中国能够比较顺畅地跨越卡夫丁峡谷。从某种意义上讲,19、20世纪快速发展的国家几乎同公有制的扩张都有关系。美国西进运动中的土地国有造成政府干预力强大的传统,英、法、德、俄在两次世界大战后公有制都大大扩张,国家实力也跃上一个台阶。

经济发展需要与之配套的政治制度,中国的“民主集中制”由国家型政党、协商民主、选贤任能机制等构成,截然不同于西式的“自由民主代议制”,更适用于非西方社会获得稳定。套用西方模式的发展中国家潜藏或明显的政治不稳定,从世界历史中可以发现比比皆是例子。正因为有了民主集中制,中国道路成为一条全新的社会发展模式。

关于中国道路有不少错误的看法,批驳它们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国道路。中国道路不是新资本主义、资本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这些对中国道路的定义都是完全错误的。从思想逻辑上看,上述几个提法都混淆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从思想根源上看都是试图用非市场的方式谋取纯粹市场经济环境下无法谋取的利益,破坏中国的广泛共识。

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是完全不同的制度。市场经济是一种客观经济法则,短时段内参与者“双赢”是其最浅显表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主观性注入市场经济法则之中,注重劳动者共同富裕,注重人的全面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同样含有主观因素,注重资本的增值,注重物的片面增长。这是两种市场经济不同的根本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一些现象类似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现象,那是由于两者都属于市场经济的大范畴,客观性的一面有相似之处,不能因此就认为两者在本质上有趋同之势。此外,现阶段人力资源重要性的提升并未消除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区别。人力资源被有的学者称为人力资本,不等于消弭了资本这一物同人之间属性的根本区别,人与物的矛盾仍旧表现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未来终将以人的全面发展告结。两者在对劳动者的重视程度上、在生产活动中赋予劳动者的地位上有本质不同。下面具体分析各种观点的荒谬之处。

中国道路不是“新资本主义”,不是走回头路。一些人认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导致了两极分化,发展个体和私营经济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市场经济条件下让一部分先富起来是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的结果,先富起来的一批人起到带动经济发展的作用。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做政治制度保证,先富起来的人并未能左右改革过程。随着“十三五”扶贫攻坚计划、社会保障范围的扩大,收入差距有望不断缩小。共同富裕一直是中国政府努力的方向。

中国道路不是资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经济,不等于资本这一生产要素独大,而是各种生产要素公平竞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参与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化劳动分工,不等于基本制度要加以改变,参与者唯一要遵守的是“双赢”的市场经济本质。中国的发展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故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社会主义。

中国道路不是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已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学者、利益集团和别有用心政客的万能贴,以此来反对新兴国家优秀民族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要求新兴国家企业私有化以利其吞噬,以图人为干预市场经济原则。中国在和资源丰富的国家打交道时目光并不仅聚焦于资源本身,而是秉持习近平主席宣布的“义利观”。具体到操作层面上,那就是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互有需要、互为优势、互为机遇,不走西方老路,不牺牲非洲的长远利益,在促进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同时让中国更好地再发展。

如同西方许多国家一样,中国政府保护自己的民族企业,但却常常被扣上国家资本主义的帽子。当今世界保护民族企业的行动已然成为政府的义务。如果回顾主要发达国家的历史,政府的身影并不缺乏,被保护的民族企业中不乏国有企业。20世纪以来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国有企业有利于在提高发展中国家经济福利的同时实现社会目标,保护国有企业有利于实现民族经济的稳步发展。

中国道路不是新官僚资本主义。有观点认为,“改革的过程已经基本被一些利益集团所左右和扭曲”,中国现在搞的是“新官僚资本主义”。无非是说现有执政集团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近年来中国实施反腐和加强国家制度建设,致力于肃清脱离群众路线和个人利益的小集团,日益强化对

背离群众利益小集团的打击,故而,新官僚资本主义纯属无稽之谈。

中国道路不是民主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同于民主社会主义。首先,在经济上主张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格局。不主张“高税收、高福利”的策略,而是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策略,以实现纵向历史的突破。其次,在政治上不实行多党轮流执政,以在独特的历史传统下确保政治稳定。再次,在文化上不主张指导思想多元化,用马克思主义思想代替传统的大一统思想维护社会稳定。

于是就引出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即中国是否存在共识的崩溃。美国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在评论美国还未处于绝对衰落时,提出了一些有趣的标准。^[5]在我看来可以简化为三条:不平等、劳动力教育和政治参与。如果从这三个标准看,中国面临挑战,但挑战并不致命。不平等的财富分配被坚持制造业发展的模式所部分化解,做大蛋糕的同时通过充分就业扩散财富。劳动力教育已经成为家庭和政府公私投资的最佳结合点。中国高等教育的入学率已处于世界一流行列,在校大学生人数居世界第一位,如何加强教育质量成为下一步的重点。中国公民的政治参与整体上处于上升的趋势。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之前呈社会动员型参与,之后通过投票和选举、人大、政协、社团、社区、网络、信访和旁听等渠道广泛参与。参与环境得到改善,“服务型”政府转型带来的政务公开,社团登记程序简化,社区更为自治,信息技术带来不受地域限制的广泛性和时效性强的参与,信访和旁听搭建了另一发言平台,各社会界别、56个民族、各大宗教都在代议制机构中有代表。在广泛参与的同时,中国政府保持对市场的规制力和长远规划的能力。

三、中国道路的适用性与意义

中国道路有助于世界工业化进程,进而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增长,推动世界历史朝纵向发展。中国进口发达国家设备技术和高端产品,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的农产品,出口从衣物、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到机械、电子设备的廉价商品。从美国到非洲人们

的生活成本大幅下降,改善了世界人民的福利。世界经济能维持多年的低通胀高增长,中国功不可没。不仅如此,中国道路还推动着世界产业升级。发达国家转而去搞附加值比较高的产业,发展中国家一些现代产业更为壮大。

从更深层次上讲,中国工业化道路适用于非西方社会。有种被学界较广泛接受的说法,即最初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形式产生于西欧社会的特殊性之中。中世纪西欧社会的基本单位是个人,世界上许多其他地区社会基本单元传统上为团体,如中国社会的家族、印度社会的种姓、伊斯兰社会的部落、氏族。如此,要迈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门槛很困难,中式市场经济不失为一种选项,人口众多而又颇具规模的后发型国家更具借鉴意义。人口众多的后发国家如印度注意到这一点,莫迪总理表示关注中国制造业吸收劳动力的方式。中国是在独立自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市场规模是赖以发展的基础之一,不仅巴西这样的大疆域国家,联合后的非洲国家亦可借鉴中国的经验。

中国道路对促进世界横向联系即全球化的发展亦有贡献。中国的发展一贯坚持自力更生,从本国实际出发制定策略。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以民族国家建设为先,没有盲从新自由主义的药方,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生产分配策略,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甚至中国道路成为新自由主义的解药。中国坚持和平共赢的对外交往策略,不断促进全球化的良性发展。

无疑,中国道路为东方社会跨越卡夫丁峡谷提供了一条可行的通途。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 [3][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三联书店,1989.
- [4]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
- [5]Joseph S. Nye Jr. Is the American Century Over? [M]. Walden: Polity Press, 2015.

责任编辑:王彩红 陈 强